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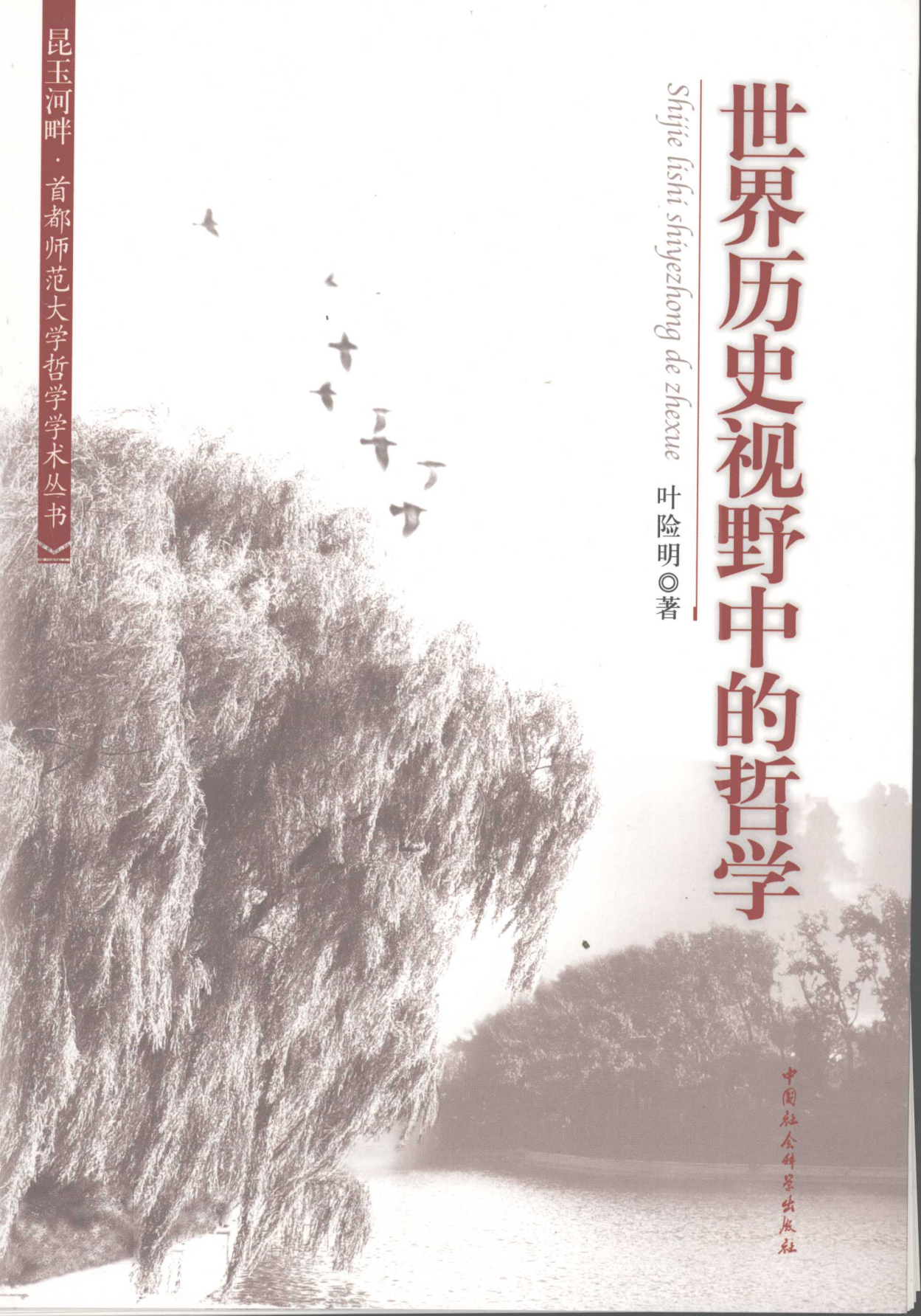
昆玉河畔·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术丛书

世界历史视野中的哲学

Shijie lishi shiyezhong de zhexue

叶险明◎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世界历史视野中的哲学

Shijie lishi shiyezhong de zhexue

叶险明◎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昆玉河畔·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术丛书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历史视野中的哲学/叶险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 - 7 - 5004 - 6741 - 0

(昆玉河畔·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术丛书)

I. 世… II. 叶… III. 马克思主义哲学 - 文集
IV. B0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10632 号

出版策划 任 明 官京蕾
特约编辑 张 丽
责任校对 修广平
封面设计 弓禾碧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980 1/16

印 张 22.25

插 页 2

字 数 409 千字

定 价 3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总 序

如果给哲学以一个意象，那么“水”或许是最自然的选择。无论在最早的希腊哲学家泰利斯那里，还是在很早的中国哲学著作《管子》那里，“水”都被认为是万物的始基或本原。它是印度的“四大”（地、水、火、风）、中国的“五行”（水、火、木、金、土）和希腊的“四元素”（水、火、土、气）之一。水是生命的源泉，生命都是从水中成长起来的。水是文明的源泉，人类所有古老的文明都是在一些大河流域内诞生的。甚且，水是人类借以自我意识的中介，在人类没有发明镜子前，水正是人类从中发现自我形象的自然的镜子。哲学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表征，是人类思想和不断再思想的学科。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缘故，水被人们和哲学家们所关注，乃至“水”成为最古老的哲学范畴或最古老的哲学范畴之一。在《圣经·旧约全书》“创世纪”第一章中，神（上帝）创造一切，但却没有创造水。水跟神（上帝）一样地原始。当代科学证明了：地球最宝贵的资源是蔚蓝色的水。假如水资源耗竭殆尽，人类的末日也就真正来临了。换句话说，只要在任何一颗星球上发现了水，就有了生命的前景，也有了智慧和爱的希望……

我们已经步入这样一个时代：通过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你我在地球任一位置上，均可即时寻找到对方的位置。现在我告诉你：中国·北京……在我们国家的首都，水资源的匮乏已经给人们带来了深切忧患。但是，在两个湖泊——昆明湖和玉渊潭间，流淌着一条这样的河流，她的名字叫做“昆玉河”。我们在昆玉河畔生活、工作和学习。在喧嚣和骚动的闹市中，有一群人沉思着，迷恋着，像昆玉河一样静静地流淌，默默地流淌……

在现代社会，哲学已经被边缘化。但任何关于“哲学终结”的理论却全都没有实际地“终结哲学”。哲学附着并渗透于人类的生活中。人类具有理性，经常并习惯于思考生活，这就是哲学存在的前提。在哲学所发源的希腊古典时代，人们认定人类的目的是追求幸福生活，认定幸福的生活就是德性的和理性的生活，认定哲学的生活方式就是理性的和德性的生活方式。所谓德尔斐神庙的箴言：“认识你自己”和“万勿过度”，正是这个意思。哲学正是这样

获得了自由、高贵和光荣。如今，哲学应当回到古典精神中去，首先并且主要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哲学既不仅仅是一种学业，谋取学历和学位；也不仅仅是一种职业，谋取职务和职称。哲学不是“饭碗”，不是为了“吃饭”所谋求的种种指标体系。而今，献身于哲学事业的人们，尤其应当“在无名中生存”，从权力、金钱和名声的浮躁中解放出来，生活着并且理性地思考着自己的和人类共同的生活。

但是，哲学并不限制于唯一现实的世界，而是开辟了种种可能的世界。哲学是一张比任何地图都更加复杂、更加丰富的地图。在这张地图上，你有你的位置，我有我的位置。你有你的世界，我有我的世界。位置不仅存在于你我所生活的物质世界中，而且存在于你我所生活的精神世界中。是的，我们正在致力于自我定位的尝试。编选“昆玉河畔·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术丛书”的宗旨是：弘扬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学术成就，系统推出具有一定学术知名度和公共影响力的老中青学者学术代表作，推动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科学术研究。丛书采用“昆玉河畔”名称，以便提炼特色，打造品牌。入选书目既包括个人学术自选集，也包括集体学术自选集；既包括学者文库，也包括学生文库，以及学科手册等等。我们计划分3批出版，每批共出版10种。这套丛书正像这条河流一样，映照着我们自己的存在。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科经历了两代人甚至三代人的发展。第一代学者的治学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以及史论结合的学风，他们那种敢于直面现实的理论勇气、敢于破除教条的思想锐气，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解放的时代风气。第二代学者治学，或阐释、或考证、或梳理，其严谨、其细致、其精微，既注意思想资源的开发，又注意当代价值的挖掘，他们这种治学态度，无不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转向的时代风气。近几年来，通过人才的引进、整合和培养，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术队伍不断壮大，尤其第三代学者的崛起，必将带来新的前景、新的希望。

当然，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术团队依然处于她的幼年时期，许多成果不够成熟，甚至充满稚气。推出这套丛书，等于一次亮相。但是，序曲已经奏响，序幕已经拉开，演出已经开始，我们期待的是理解、热情和公正的批评。

“昆玉河畔·首都师范大学哲学学术丛书”编委会

2007年4月25日于北京

目 录

第一篇 马克思哲学的逻辑及其启示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及其现代启示	(3)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哲学的现实基础	(23)
《资本论》创作·经济学研究·“人类学笔记”	(38)
马克思的工业文明理论及其现代意义	(52)
马克思有关社会主义是世界历史性事业的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72)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和逻辑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82)
关于“民族特色”的世界历史思考	(93)

第二篇 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系统化的初步尝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历史性与当代性	(103)
近代西方“世界历史观念”的形成与哲学和历史学关系的演变	(107)
论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	(120)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建构的方法和逻辑	(130)
世界历史时代与“跨越”问题	(144)
关于世界历史时代与“跨越”问题研究的方法论	(156)
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170)
评现代西方“世界体系”论	(181)

第三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上）

对全球化的一种主体性思考	(195)
全球化的基本矛盾与中国现代化	(205)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与全球化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	(209)

“政治全球化”辨析	(221)
对“文化全球化”及其意义的一种历史观阐释	(228)
对马克思现代化观的一种读解	(239)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现代化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论初探	(248)

第四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全球化时代的发展（下）

科学地规范“知识经济”范畴	(263)
关于“知识经济”的历史观诠释问题	(277)
论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结构变化	(289)
生产关系与知识所有权	(304)
马克思的“时代观”与知识经济	(316)
关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科学阐释	(330)
论知识经济与“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间关系的复杂性	(340)
后记	(347)

第 一 篇

马克思哲学的 逻辑及其启示

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及其现代启示

长期以来,在我国学术界,人们在论及过去乃至现在流行的对马克思哲学的种种曲解时,往往将其原因归咎于斯大林和苏联哲学教科书的影响,这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总结,我以为,在今天,必须从广义的思想文化层面上展开我们对马克思哲学既有认识的总体反思,而这一总体反思的首要问题就是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马克思对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科学批判间的关系。从广义的思想文化视阈上看,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过程首先是马克思对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的科学批判过程。这一过程蕴含着一个对后人具有普遍意义的方法论启示,即:只有“去”形而上学的神秘主义,并对本民族传统文化采取科学批判的态度,才能真正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搞清楚这方面的问题,我们才能懂得,过去乃至现在流行的对马克思哲学的种种曲解,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我们缺乏对马克思哲学革命文化逻辑的认识以及解读马克思哲学的特定文化语境中所存在着的問題。

“傲慢的”民族主义(马克思称“傲慢的和无限的”民族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马克思称“德国的形而上学神秘主义的形式”),是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的三个重要的构成要素。只有在对“傲慢的”民族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科学批判的过程中才有科学的哲学的构建,这就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文化逻辑。

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的形成过程始于16世纪初,即路德宗教改革时期。路德宗教改革虽然失败了,但其在整个近代西欧社会发展中却具有里程碑意义,如打破了“欧洲的宗教统一”、孕育了新教伦理价值观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等。这种意义当然包含着对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形成的重要作用,其主要表现之一是:从文化上奠定了近代德国发展的基础,规定了近代德

国的发展趋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自宗教改革以来，德国的发展就具有了完全的小资产阶级的性质”^①了。他们这里所说的“完全的小资产阶级的性质”，指的是经济状况越来越突出的分散性、政治状况越来越凸显的分裂性、新兴市民阶级越来越显现的软弱性。从文化视阈来看，德国的这种“完全的小资产阶级的性质”发展过程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是由路德的“两个世界”（即信仰的世界或基督教的世界和世俗的世界）理论确定的。其基本要义是：在信仰的世界，人是自由的，没有统治者，不受他人的支配，每个人都对自己的信仰自觉负责。而在世俗世界中，人是不自由的，个人必须服从君王和邦君的统治。当然，路德也没有把这两个世界截然分开，他认为，这两个世界都是由上帝创造的，故人的自由和人的不自由也都是上帝规定的，人必须在世俗世界按上帝的旨意活动。例如，对于生活在世俗世界的鞋匠来说，“鞋和靴”就是他的职业作品，是他的生命借以表现出意义，他不能超越这种表达生命意义的方式。路德的这一理论为软弱的市民阶级提供了重经济活动、轻政治活动的思想文化基础，孕育了软弱的市民阶级和中下层贵族用纯粹的思辨表达方式来抒发自己理想的习性，催化了具有傲慢色彩的民族主义和具有绝对服从特性的国家意识。当然，路德的“两个世界”理论的上述作用是要以一系列相关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的形成为其逻辑前提的。

自路德宗教改革以来，“傲慢的”民族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逐渐成为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中三个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对这一过程，意大利经济史学家克纳特·博查特曾作了这样精彩而深刻的描述：“从1517年以来，德意志不只是政治性的分裂，而且也是宗教性的分裂。因此，德意志首先在文学和哲学等文化领域里找到自己的民族特性；然后紧接着在1834年通过关税同盟实现了经济统一……在经济方面活跃的资产阶级普遍认为，应该尽快结束德国面临的分裂局面，因而渴望最终实现统一的愿望超过了资产阶级要求民主的欲望。从德国当时的局势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的分裂与不允许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参政相比，前者更严重地阻碍了资产阶级在国内外充分发挥其经济能力。”^②我认为这种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傲慢的”民族主义表达了德国软弱的市民阶级和中下层贵族试图用文化上的优势来“遮掩”或“弥补”其在现实中的劣势的心态，极端的国家主义标示着德国软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12页。

^② [意] 卡洛·M. 奇波拉主编，王铁生等译：《欧洲经济史》第四卷（下），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70页。

的市民阶级和中下层贵族基于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产生的对强大的世俗政府的渴望^①，纯思辨的表达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德国软弱的市民阶级在“睡帽”中进行革命的需要。“傲慢的”民族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只能首先在狭义的文化领域中萌生和发展起来。例如，在路德宗教改革不久即1534年，阿文提努斯就断言，与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不同，作为“神圣语言”而存在的德语与它的起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巴洛克时代，雅各布·波麦从宗教神学的视角宣称：只有德语保持了亚当语言的特点，故德语是最高贵的语言^②。试图在精神文化上提升德意志的国际地位，证明德意志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这一思路对德国近代主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着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

谈到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就不能不提及普鲁士的作用。17世纪初普鲁士开始崛起，18世纪形成了具有浓厚的重商主义色彩的“普鲁士王国”，从而普鲁士一跃而成为“德意志最发达的邦”，并最终主导了德意志的政治统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即“腓特烈大帝”时期，普鲁士开创了“开明君主专制”。这个体制在吸纳不少启蒙主义的思想、强调法制、容纳世界主义、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采取一定程度的宽容政策以及积极地发展教育事业的同时，又沿袭了普鲁士“国家至上”的军事国家主义传统（如强调铁的纪律和宣扬日耳曼种族优越论等），并通过一系列的对内和对外战争为未来德国的统一作了准备。普鲁士在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就在于：不仅使统一的德意志民族意识得以形成（统一的德意志民族意识是近代德意志民族文化的基础），而且使以“傲慢的”民族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为主要构成要素的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在全德范围内的最终确立。

“傲慢的”民族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这三者间具有内在的联系。这里先说“傲慢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国家主义及其相互间的联系。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揭示了德国哲学在18世纪末期的发展状况：“18世纪末德国的状况完全反映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经过历史上最大的一次革命跃居统治地位，并且夺得了欧洲大陆；当时，政治上已经获得解放的英国资产阶级使工业发生了

① 德国虽然在10世纪就有了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且延续到19世纪初，但它并不是真正的国家：无统一的法律和行政机构，也无固定的税收，更没有常备军队。正如18世纪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所说，这个所谓的神圣罗马帝国既不神圣，也非罗马，更不是帝国。拿破仑统治结束后所建立起来的德意志邦联实际上也是“徒具虚名”，各邦在内政、外交、军事上仍然独立自主。

② 参见李伯杰等著《德国文化史》，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页。

革命并且在政治上控制了印度，在商业上控制了世界上所有其他地方；但软弱无力的德国市民只有‘善良意志’。……康德的这个善良意志完全符合德国市民的软弱、受压迫和贫乏的情况，他们的小眼小孔的利益始终不能发展成为一个阶级的共同的民族利益，因此他们经常遭到所有其他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剥削。与这种小眼小孔的地方利益相适应的，一方面是德国市民的现实的、省区的褊狭性，另一方面是他们的世界主义的自夸。”^①“德国市民的现实的、省区的褊狭性”与“他们的世界主义的自夸”的结合，就是笔者所说的“傲慢的”民族主义。其文化心理基础是：试图在精神文化上提升德意志的国际地位，证明德意志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哲学在18世纪末期发展状况的科学揭示，也就是在方法论上对整个德国文化在18世纪末期发展状况的科学揭示。德国哲学家费希特于1807—1808年所发表的《致德意志民族的演说集》，标志着“傲慢的”民族主义在全德范围内的确立。在费希特看来，德意志民族是“元民族”，是最古老、同世界本源联系最密切和最直接的民族，其主要标志之一是：德语是“元语言”，即同德国文化保持着最密切和最直接联系的语言。德语中的日常的、形象的、感性的词汇可以表达最抽象的东西，使超越感性和经验的东西变得可感觉，容易理解。可以认为，19世纪初“傲慢的”民族主义已经渗透到了德意志民族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

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主义灌输的是抽象的国家概念和爱国精神，其基本内容是：国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需；国家是最高、最普遍的存在；个人依国家而存在，无国家即无个人，牺牲个人的自由、幸福以效忠于国家。极端的国家主义除了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主义的特征外，还具有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主义所不具有的特点，虽然一般意义上的国家主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易于转化为极端的国家主义。除具备“国家主义的一般”外，极端的国家主义还具有明显的扩张主义、种族主义的倾向。极端的国家主义在德意志文化中的滋生和发展也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长期的分裂割据带来的经济落后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受制于英法的状态，在特定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工商业发展对政府的依赖性，再加上日耳曼民族在西欧中世纪社会形成和发展中的特殊作用给德意志人带来的文化心理方面的优越感，使德意志人对建立近代意义上国家的渴望具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中的极端的国家主义正源于此。从方法论上看，作为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重要构成要素的极端的国家主义在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中获得最完备的表现。如果说，在康德那里，国家与思想的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11—212页。

由还有矛盾的话,那么,在黑格尔那里,不仅作为客观精神的国家直接规定了国家成员的客观性和伦理性^①,而且把作为客观精神的国家的发展同日耳曼人的绝对优越感在逻辑上紧密联系起来^②。

对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来说,极端的国家主义和“傲慢的”民族主义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傲慢的”民族主义必然在方法论上导致极端的国家主义,而极端的国家主义则是“傲慢的”民族主义的逻辑延伸,是“傲慢的”民族主义在国家组织形式上的确认。这两者在逻辑上是互为前提的。^③“傲慢的”民族主义的最高存在就是“普遍的国家秩序”,而“普遍的国家秩序”又会进一步促进“傲慢的”民族主义的发展。从历史上看,以普鲁士为轴心不断在整个德国扩散的统一的德意志民族意识和“傲慢的”民族主义蕴含着极端的国家主义,而以普鲁士为轴心不断在整个德国扩散的极端的国家主义则是对“傲慢的”民族主义最大限度的确认。自19世纪初特别是拿破仑统治结束后,随着德国市民阶级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发展,受当时的达文主义、浪漫主义、英雄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等社会思潮不同程度影响的“傲慢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国家主义,具有了真正的全德意志的性质(虽然德意志在1871年才组成所谓“国家”)。

再说极端的国家主义和“傲慢的”民族主义与纯思辨的表达形式间的联系。在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中,纯思辨的表达形式并不等于“傲慢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国家主义,但却是“傲慢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国家主义存在的主要方式。纯思辨的表达形式有三个相互联系的特点。一是超现实性。这里所说的超现实性不是对现实的批判或者辩证的超越,而是指回避现实或虚假地摆脱现实。二是超历史性。这里所说的超历史性也不是指历史时间的跨度大,而是指缺乏历史规定性,其主要表现之一是:把一个需要说明的孤立“事情”或论断“作为不证自明”的逻辑前提,即全部学说由以出发的基础。三是纯概念的逻辑推演:“先从事实得出一个抽象概念,然后宣称这个事实是以这个抽象概念为基础的。这是给自己装上一副德国人的深思的和思辨的姿态

①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1年版,第40—41页。

② 同上书,第338页。

③ 从方法论上看,极端的国家主义和“傲慢的”民族主义间的区别与联系类似于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间的区别与联系。这两者间的区别是:“文化民族主义”还没有直接提出民族的国家形式的要求(如在18世纪以前的德国),而“政治民族主义”则直接诉求于民族的国家形式了(如自18世纪以来的德国)。这两者间的联系在于:文化民族主义在逻辑上必然导致政治民族主义,而政治民族主义又反过来推进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间的区别和联系,在方法论上给我们全面认识极端的国家主义和“傲慢的”民族主义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的一种最便宜的方法。”^① 在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中，极端的国家主义和“傲慢的”民族主义只有通过纯思辨的表达形式才能够发展起来并充分地表现出来。因为，与英、法、荷等国家市民阶级相比，德国市民阶级的发展步履维艰。当英法资产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德国资产阶级还仅仅停留在“阶层”的水平，并时常受到他们的“欺辱”（正如马克思所说：“德国的思辨的抽象和自大总是同它的现实的片面性和低下并列”）。而“表达形式”的超现实性、超历史性和纯概念的逻辑推演，恰恰构筑了德国软弱的市民阶级生存和发展的“文化渠道”。这一渠道不断地传导着它的“雄心壮志”。正是通过纯思辨的表达形式，“傲慢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国家主义才全面地渗透到德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逐渐由纯文化形式走向政治形式。

最后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讲极端的国家主义、“傲慢的”民族主义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是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三个主要构成因素，并不意味着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就等于近代德意志民族文化，也不是说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就等于极端的国家主义、“傲慢的”民族主义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同时，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即便是极端的国家主义、“傲慢的”民族主义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也曾在近代德国社会的发展中起过多方面的重要作用。例如，随着德国统一运动的不断深入，“傲慢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国家主义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的确起到了激发德国人的爱国热情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特定历史作用，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则孕育了德意志民族爱好哲学的特长和在精神领域中比较彻底的批判性等等。但是，在近代德意志民族文化背景下发生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必然首先是对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局限性的超越（对马克思来说，对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局限性的超越在逻辑上内在地包含着对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局限性的超越）。而从15世纪就开始受启蒙主义影响的近代落后的德国所具有地理位置的开放性（这使得它往往成为西欧乃至整个欧洲矛盾的中心），以及国内文化和政治的无中心性等，又为对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的科学批判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

本文关于马克思哲学革命文化逻辑论断由此得以成立的根据在于：从前提看，对“傲慢的”民族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的科学批判，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逻辑基础；从过程来看，对“傲慢的”民族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69页。

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的科学批判，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一条逻辑主线；从结果看，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完成是对“傲慢的”民族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科学批判的逻辑延伸。

当然，马克思哲学革命文化逻辑的形成也是与马克思理论和实践活动的境遇分不开的。在青少年时代就深受启蒙思想影响的马克思，在其哲学革命的过程中所直接遇到的主要论敌往往就是作为“傲慢的”民族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纯思辨的表达形式的典型代表，如：以鲍威尔兄弟、爱·梅因、路·布尔和麦克斯·施蒂纳等人为核心的“自由人”，以莫泽斯·赫斯、卡尔·格律恩、奥托·吕宁、海尔曼·皮特曼等人为核心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深受这两个流派影响的魏特林和普鲁东等等。这些论敌的思想对德国思想文化界的不良影响最大，故不能不成为马克思所直接批判的对象。这也说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并不是他本人事先预设好一个什么宏大的构想，而是根据批判、自我批判特别是革命实践发展的需要，发动了一场恐怕连他本人当时也没有完全意识到的对人类社会产生如此深远影响的哲学革命。这种批判具有世界历史意义，故他所构建的新哲学也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1. 对德国哲学纯思辨形式的批判

马克思对德国哲学纯思辨表达形式的科学批判，是马克思对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科学批判的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因为，要全面开展对近代德意志主流文化的科学批判，在逻辑上必须首先开始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基点，而这只有通过德国哲学纯思辨表达形式（德国哲学的纯思辨形式集中地体现了作为近代德意志民族主流文化构成要素的纯思辨表达形式）的科学批判来实现。

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一文中，马克思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对德国哲学纯思辨形式进行了尖锐、深刻的批判。其主要内容包括这样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其一，关于德国哲学纯思辨形式的根本弊端：“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喜欢幽静孤寂，闭关自守并醉心于淡漠的自我直观”，“它那玄妙的自我深化在门外汉看来正像脱离现实的活动一样稀奇古怪”。其二，“真正的哲学”应有的特性：“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其三，新哲学是反纯思辨形式的。在哲学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同时，哲学对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这种哲学思想冲破了固定不变的、令人难解的体系的外壳，以世

界公民的姿态出现在世界上”^①。在上述第一、二点中，马克思指出了德国哲学自身存在着的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即反映现实世界与脱离现实世界的矛盾（也可称内容和体系的矛盾）。“就其内容来说”，德国哲学也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是文明的活的灵魂”；但就其形态来说，德国哲学却拒现实世界于千里之外，醉心于淡漠的思辨。德国哲学本身的这种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会导致旧哲学形态的衰落和全新哲学的产生。在上述第三点中，马克思提出了德国哲学发展的主题和趋势：破除哲学的脱离现实的抽象的思辨外壳，使哲学不仅“就其内容来说”，而且就其“表现来说”，真正成为关于“世界的一般哲学”即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所提出的关于“世界的一般哲学”理念在逻辑上就包含着对德国“傲慢的”民族主义和极端的国家主义的批判和超越。

对马克思来说，对德国哲学纯思辨形式的批判是不能仅在哲学批判的范围内进行的，而必须打破传统哲学框架，超越一般哲学批判的视阈，借助于对其他具体科学研究成果的方法论上的概括和总结，首先是对历史学研究成果的方法论上的概括和总结（也可称历史学批判）来进行。《克罗茨纳赫笔记》就标志着马克思对德国哲学纯思辨形式的历史学批判的转向。而这种转向必然在逻辑上沟通对德国哲学纯思辨形式社会主义批判的路径。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开始把对德国纯思辨形式的批判与社会主义批判紧密结合起来。在该文中，马克思批判了德国的“实践派”和“理论派”从两个极端歪曲哲学与现实世界关系的错误，他指出：“德国的实践派要求否定哲学是正当的。该派的错误并不在于提出了这个要求，而在于仅限于提出这个要求……它的眼光的狭隘就表现在没有把哲学归入德国现实的范围，或者以为哲学甚至低于德国的实践……一句话，你们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②马克思在这里所讲的“哲学”是指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最系统、最丰富和最完整的阐述”的“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即关于现代国家的“抽象的、脱离生活的思维”。而“实现哲学”，就是指把“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作为德国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加以批判的哲学，即马克思正在创立的新的哲学世界观。马克思说：德国人民不仅要批判现存的制度，“而且还要批判这种制度的抽象继续（指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引者注）”^③。德国的“理论派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虽然是在相反的方面）”。“它……没有想到现存的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121页。

② 同上书，第459页。

③ 同上书，第458页。